

●史海钩沉

津西理教活动始末

王鸿逵

一九八六年第三季度,区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组与文化艺术组合并,成立了文史工作委员会,拟着手征集津西文史资料,因事属初创,决定先去各地兄弟区县取经学习,我们先去了蓟县,到达后,受到了县政协领导的热情接待。蓟县是数千年的文明古县,向为人文荟萃之地,古迹名胜,美不胜收,政协的建立也比我区早,又是解放前的华北抗日根据地;交谈中曾谈起当年两地理教发展的历史情况,后来我写了“理教的起源与发展”等资料寄给蓟县政协,承蒙鼓励将拙文收入1988《蓟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。1990年10月《天津市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五十二辑又转载了这篇文章。当时这篇文章,因为是写给蓟县的,故侧重了蓟县理教起源情况,而对其在本区的历史沿革涉及甚寡。现就我区的理教发展情况,补述如后。

(一)

据教史材料及历代口碑所传,理教创始人羊宰、道号来如,原籍山东省即墨县羊各庄人(1621—1753),明崇祯末科进士,清兵入关,羊宰抗节不仕,后隐居於蓟县岐山澜水洞中,潜心研究理学,逐渐悟出理教,又吸取白莲教纲领,后衍化成理教会道门,并制订了授徒行礼仪式“金斗报母参”,传念五字真言及禁烟、忌酒,不拜偶像、不烧草香,不焚化纸帛钱俑、不养鸡、猫、狗等八项戒条,奉为金

科玉律。并采撷山内中草药野生黄芩等熬成茶膏，治病救人，做为传教媒介。康熙八年(1669)农历正月，正式开辟理门，传授徒众，并规定师徒平等，不论年龄大小，受点传的一律称为新师弟，赐法号男的排为“来”字，女的排为“如”字，若干年代也不能更改。为了弘扬理教，在康熙四十年(1701)，年已八十高龄的羊宰，又亲自下山，在直隶(今河北)省境内云游，逢村过店，宣道度人，经过了五年时间，前后在八处地方，共收徒十五人，这就是理教史上所称谓的八方度，天津市西头双庙街为第五方度，收徒李奎(道号来悟)张吾山(道号来引)二人，杨柳青碾坨咀渡口为第六方度，收徒董来真、刘来纯、达来鼎三人，在这两处中以张吾山、董来真、刘来纯三人笃信最深，对以后的理教传播贡献颇大。

1. 张吾山，自皈理后的三十年，1745年还去蓟县朝参师尊羊宰，得赐大葫芦，做为信物。(此葫芦为邵公庄公所继承，后该所领众尹师传授大法於河东公所领众杨静如时，又将此葫芦转赠，因而有“东凭葫芦西凭法”之说，)又指引小园村(今西营门辖属)之周瑞芝去蓟县求师皈理，被羊宰收留洞中学习，晚年更收其自营之德裕麸房职工尹岩为徒，尹岩即是在天津邵公庄首创公所之尹师，后来声望仅次于羊宰。

2. 董来真皈理后收徒船户王顺子，王顺子自有小船，常往返山东临清一带，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卫河决口，在风浪中，几乎船毁人亡，飘泊百余里，数日后始遇救生还，王顺子大难不死，认为神助，因而信仰更坚，丧偶后复娶张四姐为继室，即后杨柳青二众公所创始人。

3. 刘来纯指点碾坨咀村之王来永去蓟县投师皈理，被羊宰点传后放为八方催众，经常下山与各方度道亲进行连络。

创教人羊宰回山后又先后招收了十大弟子称为坐山师，包括小园村之周瑞芝(道号来青)和碾坨咀村之王来永。但他感到虽然是在直隶省内立了八处传教点，惟恐师徒们累代相传，只凭五

字真言与金斗报母参，很容易把教义走型出偏，因此不断与坐山师们互相研究，拟定组织方法，重新制订了一套建立集会、传教、歌赞、摆斋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，由第十坐山师毛来迟携带下山，传授於张吾山的弟子尹岩。理教在天津及西郊才正式逐步发展起来。

(二)

对这些规章制度，理教人称为法包，其具体内容是：成立集会地点称“公所”，掌教人称“领众”，下设帮办教务的称“催众”，管理财务、事务的称“承办”，每公所有领众一人。催众和承办根据公所大小、可多可少，一般催众最少五至七人，分几个等级，品优者可逐步提升，最高者是帮坐，在领众升坛传点新理时，分在两旁静坐，这些人往往是领众的接班人，其次为求师、引师、带道师等。承办人是对公所热心工作，并在地方上有一定声望的道亲（有的就是成立公所的组织者），总管公所内一切财务收支和事务、公产。下分帐房、采买、外交、保管等，遇有公所开支不足时，办理向外筹措募捐等事项。另外还有“羊祖大法”，羊祖大法是二十句极机密的法语，只传到领众这一级，当年毛来迟由蓟县澜水洞下山，把法包交付尹岩时，尹岩即按羊祖大法，默念记熟，向成立其他各处公所领众传授，将原来文字大法锁置一木箱中，称为法箱，二百年来，除天津西老公所历代领众外，其他各处公所领众很难见到，所以以后领众对新任领众，都是口传，凡能听到这羊祖大法的就有了当领众的资格，可以传授新徒。在公所里当了领众，就等於出家修行，一切饮食生活，全由公所供养，三餐之外，不吃零食，不过问公所财务、事务，除按斋日集会传点新徒和受道亲参拜外，自己每日按时静坐，养性练功，死时能端坐僵化，就是功德圆满，丧礼也异常隆重。其他人士全是

义务职，斋日集会虽系承办、帮坐等职，也要交付斋份用餐。

(三)

据我所知，在西青区及附近村落共有公所九处。

(1) 东二众公所 地址在杨柳青大寺胡同碾子根，首任领众为张四阻，回族，原藉沧县人，时年二十三，嫁与四十岁船户王顺子为继室，王顺子为羊宰之徒董来真再传弟子，皈依理教，意志虔诚，张四姐受其夫影响，在乾隆末年（约 1795）受天津梁家咀公所尹岩传点，后又接受大法，在嘉庆七年（1802）建该公所为首届领众，是天津县唯一的二众公所，各处公所领众均尊称其为“大师姐”，六年后（1808）北京清政府以白莲教在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陕西等地，不断组织起义，诏示京城附近各县，严禁秘密集会和蛊惑人心的传播，双庙街杨青司驿丞马骏发，即以理教领众常年身穿孝服，集会传点皆在夜间，五字真言有不传父母妻子等情，摭拾上报，因而梁家咀公所被炮击平，查抄解散了各地公所，直到嘉庆末年，才稍为放松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鸦片战争后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，随后大批鸦片源源涌入中国，使许多意志薄弱者吸食成瘾，无不形销骨立，家败人亡，有识者均谋求抵制之道，因理教向以克己修身、戒烟忌酒为准则，也就应运而昌，被地方政府默许了。光绪年间二众公所第三代领众孙奶奶，虔心修行，无病坐化，地方仕绅醮资，在胡同内搭起彩棚，大办丧事，天津及外地理教人士多来参加葬礼。从而使皈依者人数大增，在这期间，大众公所也先后出现了三处。

(2) 正安堂西老公所 地址在杨柳青后大道老公所胡同内，约建于嘉庆末年，因当时政府对公所还没公开弛禁，一切斋日集会传点新徒，全是在悄悄进行，故其始建沿革，皆无可考。我於 1930 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皈依，那时才十二岁，是经过催众戴筱臣（冰

窖经理)的介绍,他因病在家,把我托给了引师张殿顺,在头一天的晚上去了公所,八点听领众徐师夫讲解八方度的历史,到十点、张殿顺把我叫到堂屋里学习“金斗报母参”的行礼仪式,并填写了请求皈依的喜单,内容是皈依人的姓名、年龄、及引师、求师、传点师等姓名,传点的年月日。喜单写完后,张殿顺还嘱咐我在点传时应该怎样行礼、应答等规矩。十一点领众和帮坐依次在里间大炕上升座,求师、引师在炕前站立,一切准备好开始传点,这次皈依者十儿人,我排到第二名,这次传点阵容不全,没有带道师到场,张殿顺就身兼二职,忙里忙外,他当时从里间走到外间,将皈依人的喜单拿到里间,按次唱名,第一名是一位莱农,听到唱他,就走到里间门口,将左腿迈进门坎,张殿顺上前接过他的手念出了几句歌赞:“圣宗造下渡法船,千山万水来结缘,今日接到师夫理,满门吉庆保平安。”领众盘膝坐近床沿,这时求师接过喜单上前说:“今有某某人虔心求理,请师夫慈悲。”领众答:“师弟功德”。引师领这位新理跪在床前,领众手持喜单看了名子后,即用熟记的五十三句话,来向新理问答,大意是“你皈依是否自发心愿?或被他人所劝”,回答必须说:“弟子一心情愿,请师夫慈悲。”这是带道师教演礼时谆谆教给的,师夫说:“好”,“我今教你五字真经”,师夫搬动新理者五个手指,念“观、世、音、菩、萨”,念一字,搬一指,然后自己再念三遍。师夫说:“真言以后永不许出口,要上不传父母,下不传妻子。”“要谨守八条戒律,如以后偷吃烟酒,传外人,必遭凶灾横祸。”最后还说:“要孝敬父母,爱惜手足,和睦乡邻,知尊敬长,处事要公平,不可贪便宜,便宜到不了咱们手,回家后与长亲叩头。”这五十三句语言,理门中称为五十三参,受过五十三参的人,就是在理的道亲了,随后新理徒站起来说:“谢师夫慈悲。”仪式就算完成。这十儿人依次点传,大约要两个多小时。

第二天是正斋口集会日,今西青一带像这样的大小斋口每年

共六次：农历二月十九日（观音诞辰）。四月初八日（如来佛出家日）。六月二十日（羊祖了凡日期，本为六月二十四日，因与关帝庙会错开，提前四天）。九月初九（重阳节）。十一月十二日（领众邵二爷了凡日）。十二月初八日（尹来风先师了凡日）。以二月十九、六月二十、十二月初八三天称大斋口，上斋的道亲也最多，我当初的皈理费是一元，用斋费是六角，上斋时另外还有自愿捐助的，餐厅里常有用半张黄纸长条写的“某某人愿切面若干斤或足用，还有愿猪肉、大米、蔬菜、和银元的，所以斋日过后，常有馀裕，留做公所其它开支和领众的生活费。催众和承办虽然都是义务职，但在斋日前后公所也要供给几次饮食，1. 催斋 在每个斋口前四天，承办与催众到公所来，承办们要清扫卫生，安置炉灶；搭棚、结彩等，催众要印刷请帖向绅商户撒放，请帖形式是预刻木版印在长六寸、宽四寸的红单帖，字用竖排，如二月十九日斋口请帖是：

本月十九日为 圣宗古佛诞辰是日悬灯结彩候 光 某某堂老公所众催众谨具 八方道亲 驾临求顺

单帖根据需要印出若干张，由催众人等分往投送，这些执事人等，公所都要供给一顿打卤面。2. 斋口集会过后，总要剩下一点饭菜，这些饭菜，也由承办，催众等分享，往往要吃几天才能吃完，名曰：“吃馀斋”。

（3）同安堂河南老公所 地址在杨柳青镇旧运河南岸十六街公所胡同，初建于光绪年间，因领众邵二爷和杨三爷先后了凡时坐化，而名声大振，从清末到民初，催众、承办等阵容亦很整齐，领众姓魏，承办有船户陈玉，有东丰台经营三立酱园的李某（秀

才)和始迁户高居宝后裔高善修,后来文发居肉铺之刘丰等也加入进来,这些人办事认真公正,领众魏氏了凡后,继任者为孙少先,(蒋庄人),直至解放后止。

(4) 复善堂东公所 地址在杨柳青镇后大道取灯胡同北口对过,建於清光绪十五年,第一任领从姓氏不详,常劝人静坐调息练功,谓可祛病延年,有公所看门人秦福来,他已届中年,盘膝不便,只好於夜间静坐时,两腿交叉落地,日久居然也能入静,后因公所寄居者多,人声嘈杂,夜晚借住养车户张明家,如是近二十年,民国初岁(1912)之夜,在椅上端坐而逝,众承办以无法殓坐缸中,乃用木板将椅子四面上下封严,殡葬於理门公地内西南角,不久某领众亦病重,任第二代者为魏有兴,魏有兴武清县梅厂村人,本一挑卖颜料小贩,寄住於公所内,人很老成勤快,每日晨起房院打扫整洁,常年如一日,深得公所内外人士所称赞,后参与公所事务,由催众升至帮坐,第一任领众病危,经公所众道亲推荐,得授大法,不久继承正位。魏有兴上任后,在教务方面,很想有所做为,他任命了几位催众,对传点新理,斋日受道亲参礼,都办得井井有条,其他在公所以外的教务活动,如参加天津理教联合会分会的成立会商,除夕夜在公地宣讲教义,碾坨咀和当城两村成立新公所,他也应邀去给新领众传授大法,指导布置新公所的传教仪式等,从而深受全镇道亲的尊敬,民国三十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(1942年1月17日),魏有兴偶感风寒,按照惯例,领众是从不吃药的,只凭静坐功力调养,十二月初八日斋期过后,再加劳累,体力更不能支持,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有姜店胡同潘家,每年除夕卖几斤糕点来上供,还捐送几块钱,魏勉强由看门人扶起披上衣服道谢。潘走后公所承办张栋华来看魏见他两眼上翻,与看门者二人赶紧代为穿好衣服,将两腿盘好,戴上风帽,项上挂上串珠,手里摆上葫芦。张栋华扶住头,顶住腰,令看门人打开门窗,不久尸体僵挺,宛如坐化。次日举行装殓,接

受各处道亲参礼，半月后殡葬於运河南公地。此次办理完毕，余款两千余元，公众议定存於桐兴厚酱园生息，后继领众刘德全，西马庄人，王宝，杨柳青镇一街人，直至解放。

以上称为四大老公所，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起，又陆续建立了公所五处：

1. 同善堂中公所 地址初建於杨柳青七星庄东，后迁入八街姜店胡同内。

2. 永安堂公所 地址在杨柳青西头公议胡同内。

3. 西二众公所 地址在杨柳青十街经堂庙内。

4. 碾坨咀公所 地址在本村内。

5. 当城村公所 地址在本村内。

这五个公所规模较小，斋日集会，皈理新徒，都远不如原四大老公所

此外尚有大众、二众公地两处，各占地二亩余，是专为临死坐化的领众，埋葬殓缸的地方，大众公地又称邵二爷坟地。因初葬领众邵二爷而得名。至清末民初，地内又有领众杨三爷和东公所看门人秦福来墓三座；二众公地内只葬有孙奶奶坟一座；地址均在今理工学院分院内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去新疆伊犁贸易商兴泰和京货店，原系几个人集资经营的，其中一经理韩乐山，突然患了老年痴呆症，店内诸股东经理等研究，派由另一名经理宋友新护送回乡疗养，谓如能一路平安，到家后可捐资办点善举。根据韩乐山家属意见，韩乐山当年曾有过将来整修公地的想法，因此立即备料鸠工，首先把三座坟墓砌起砖石，上以麻刀白灰幔顶，地面全部用灰土夯平铺砖，并在坟前参拜处各镶好有两平方米的青石板，四边周围垒起两米多高的花墙子，门楼为牌坊式，上镌“公地”两字，进门迎面筑起砖砌大影壁，参拜者可由左右环绕出入，很是肃穆庄严。公地修好后，本地地理门众承办议订，每年除夕日在坟地内搭一大暖棚，靠墙搬来几案桌椅，生好大火炉，棚

内温暖如春，请来东公所领众魏有兴在此讲教说法，接受众道亲参拜，共同守岁。在由街里来公地必经的中渡口整夜司摆，由中渡口下坡沿途，临时安装煤油路灯百余盏，公地花墙南端插一两丈五尺杉杆，排挂起三角形羊角灯塔，把公地门前，照的如同白昼，这些都是由安离二局水会众伍善组织的。自从公地修好后，这里一改过去的荒芜景象，一举成了镇上的一大胜地，每次斋口新皈理者和道亲，多到这里参礼。因该地整洁幽静，春游者也常来这里小憩野餐，夏天附近的农民，更以此为歇晌地。公地大门外的南侧，还设有两口小水缸半埋土中，镇内慈善机构在芒种到处署期间，派人每日挑开水一挑，淘换新水，并放一小木勺，供路人饮用，每月还有人送来条帚，供来此者清扫。

(四)

理教虽然到清末就可以公开活动了，但因没有为政府所承认，所以也偶尔受到地方的干扰，北京的道亲中有一李钟豫字毓如，原籍江苏淮安，因自号“江淮散人”，光绪末期举人，工於诗、书、我手中今还有他写的一副对联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他与另一名闻人苑文鉴，组织了一个全国理门公所总机构，呈请内务部立案，并疏通了当时总统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，取得支持，在北京挂甲屯悬起了“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”的牌子。李毓如当了总会长。李是个文人，不会管事，只办些宣传材料，出过一种期刊《理铎》和《理门须知》等书，发行全国。其他一切内务财务全由苑文鉴把持，苑想把全国各地公所统由总会领导，行文各省市县，所有理门公所都要改成总会的分支机构，经办人必须向总会申请登记、批准，每公所要交一至二百元手续费用，俟审查批准后，领到委任状、公章，才能生效。这样总会既可成为管理全国公所的中心，又可从中捞得很多油水，他们先从北京做起，又派人到天津来活动，并

以总会名义向警察厅长杨以德发来公函，请予协助，杨则答复：“理教系属民间团体，官方不便参与”，从而未能得逞。鉴于天津比北京的公所多约两倍，是一块大肥肉，后来他们又多次想方设法，但都没有成功，最后民国六年再次来天津，又因天津水灾，空手而回，不久苑文鉴死，李毓如也辞职南归，会长改由谢天民继任，谢天民是个鸦片鬼，就更没人理睬了，但天津理教人士也从中受到启发，在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由天津西老公所为了加强联络团结，倡议成立“天津市理教联合会”。并报请市政府备案，以西老公所领众蔡雨村为理事长，下设分会，各处领众、催众、承办人等，都是当然会员，杨柳青分会设在后大道正安堂老公所，发给了证书。催众戴筱臣病故时，在他的殓衣胸前还挂着一个椭圆形的会员证章。

基督教传入津西百年

邵宗正

一百多年前，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兴盛时期，英、美、法、俄等国，为扩张自己的势力，掠夺它国资源，对经济落后国家，特别是对中国争相进行侵略，以致 1858 年英、法勾结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攻陷了天津大沽口，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天津条约》，使天津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。洋人、洋货、鸦片一起涌来，划定紫竹林海河一带，为它们的租界地，随着军事、经济侵略的节节深入，精神文化侵略，也随之而来，他们建教堂，办学校、开医院、搞仁慈堂，打着各种堂而皇之的幌子，加紧向中国内地扩展势力范围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 (S. W. Williams) 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 (W. Ilqiam Maytin) 分别作为美国公使列威廉 (William B. Reed) 的秘书和翻译，共同策划把保护传教活动塞入《中美天津条约》，在其规定的第三条写到“耶稣教（基督教）、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”，“入内地传教之人，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”。有了这一条外国人不但可以随意向内陆各地传教，并受地方官员保护了，以后美、英、法等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了天津。

自公元 1875 年美国传教士，以北京、天津为中心点，不断向天津附近和整个华北地区开辟布道区域。美国传教士达吉瑞 (G. R. Devis) 来到天津后建立起维斯礼堂，大搞布道活动，并培训中国教徒和传教士。到公元 1892 年由天津县城传入西部农村一带，

发展了部分教徒，无论是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皈教信徒，他们绝大部分在当时是动机不纯的，有的传教士随着外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后，负有双重任务，其一是以宣传布道吸收教徒；另一方面藉机刺探我国军事情报，测量地形地势，搜寻矿产资源，文物古迹，以便计划掠夺。而中国的皈教分子也很复杂，其中一部分是名人、知识阶层，虽然痛恨这些侵略者，但认为帝国主义者的国家科学都很发达，这些就是中国失败的致命点，所以必须“师夷之长，补我之短”，只有加入教会来长期接触他们，可以从中获得教益，对他们披着宗教外衣，开办学校、医院，则表示欢迎的态度，以便利用来培养高科技人才。另一部分是虔诚的信仰者，但看不惯那些传教士豪横不法态度，主张自办教会布道。其余是一般老百姓的赤贫者，传教士给予一些小惠，拉拢入教，当时民谣中流传一首顺口溜：“老乡、老乡你为甚么要入教？为的是三块北洋造（银元）花完了怎么办？再向神甫要；神甫要不给呢？从此不登教堂门，算我没入教。”还有一些经常受地方恶势力的期压，他们投靠教会，取得洋人的庇护。再有就是地痞流氓，受到传教士的收买，做为汉奸鹰犬，他们假借洋人势力，横行乡里，地方官也奈何他不得，这种人被广大群众深为痛恨。还有与洋人有交往的买办、受雇的职员杂役等等。其余虔心皈主的是极少数。。

早在1899年（光绪二十五年），伦敦会教友陈翰臣，联络本会教友多人，提倡华人自立，在老西开（今国际商场附近）地方，租了两间平房，开门讲道，定名为“华北自立会福音堂”。办了一年多，就因庚子（1900）义和拳的兴起而停顿了。次年（1901）又有伦敦会教友凌锦泉发起“公益会”。联络教友筹办自立，不足一年，又停顿了。随后凌锦泉没有灰心，他又向伦敦会以外的教友联系，计有山东长老会的教友仲子凤、圣道堂教友左敬之等，发起联合会，联系伦敦会、公理会、美以美会、圣道堂等诸教友筹办自立会，但遇到英藉收师甘霖和宝复礼两人的反对，他们说：

“华人自立不了”。由此自立会又复搁浅，自立会暂时的停顿、教友们并没有灰心，依然不断连络同志进行酝酿，直到1908年凌锦泉又与教友张芝庭、张葛孙、陈浩然、许敬斋等继续鼓吹提倡，又得到英国人施敏斯（伦敦会医院眼科大夫）起来赞助，在城内府署街罗家胡同口，施大夫施医的房子里，成立了一个“公祷会”，专门为自立会祈祷，后在众教友捐助下，又在伦敦会借了点钱，在南门外典当了四间土房、名曰：“自立会福音堂”，每日开门讲道，大约有两年的时间，由於该地当时地旷人稀，听道的和做礼拜的都没有多少人。

1910年6月有一位知名人士刘宝慈（公理会教友），出面提倡，召集了天津七个会堂、五个教会的教友1百多人，在城内经司胡同青年会（东马路会堂尚未开工兴建），讨论创办自立会问题，当得知原鼓楼东公理会旧会堂因已迁新址，现在正空闲时，就推举教友徐汇川、张伯苓向公理会玉嘉立牧师借用作为试办，把南门外房子交原主赎回，将赎房款和家俱均归并入这个试办点，并推举了董事十四人，这十四人都是当时社会名流，计有张葛孙、许静斋、陈浩然、仲子凤、张伯苓、张佐庭、王厚斋、崔润生、宋愚溪、朱荇臣、刘巨川、刘凤岗、刘玉成、欧阳旭德。又推举了执事一人凌锦泉拟定章程，请刘善庭牧师主持教务，於十一月二十日行贺堂礼，这一天“天津自立会”就算正式成立了，名称为“中国基督教会”。

天津中国基督教会成立后，北京也响应号召，於民国元年（1912）五月二十日开成立大会，天津派出南大校长张伯苓去京祝贺并演讲，从此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都先后成立了自立、自治、自养的中国（华）基督教会。

自从1892年基督教传入津西以后，当时张家窝、郭庄子、古佛寺、周李庄等有十多个村发展了教徒二百余人，1900年义合拳兴起，这些教徒有的逃往天津紫竹林，或其他外地、没有来得及

跑出的大部遭杀害,1902年这些地区都平定了,教民们大部返回,就在张家窝乡的董庄子村,重新建立教堂,有东房五间81平方米,北房盖了一个大礼拜堂,约120平方米,以后教徒至四百余人。在杨柳青当初只有一户,姓王、在天津紫竹林做小贩生意,义合拳的拳民曾找过他,没遇上,烧了他两间住房,后由支应局赔款重新翻盖。1903年创建了福音堂,在十一街公议胡同。后又在平安大胡同4号正式修建了九间房约180平方米,房屋建成后杨柳青受洗入教的不多,主要是附近的桑园村,碾坨咀村,大柳滩、当城、马庄等十多个村庄,发展教徒约200余人,传教士也都是由天津美以美会派来的,先后有金城和他的儿子金希真、荆国亮、冯广信、李永德、王子骞、最后是在大城呆过又从天津三义庄调来的张郁文。直至解放前后,张仍负责教务活动,并由本镇人刘瑞岐担任执事。

北伐后在杨柳青还出现了一个神召会教堂地址在药王庙后,沦陷前迁入后大街石家正廉堂前院北厅(今永远胡同15号)传教士先后有那景泉、周玛大(女、美国籍)、张希梅、张印三等。

1939年所有在华北沦陷区内的教堂,都逐步的停止了活动,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,国民党接收后的城市里,各种派系的基督教堂,又开始萌动,但已明显减少了很多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在解放初期有外国教会近70个,大体分属121个外国差会,其中美国差会约占一半。到1950年7月,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《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》宣言,号召中国基督教会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,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,实行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这一宣言深受广大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,於1954年7月,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,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统属该委员会领导。

基督教在我区随着社会的变迁,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,概括

情况如下：

1892年至1899年，为基督教传入和开始发展教徒阶段。

1900年1至8月是义和拳反帝爆发时期，许多教徒被杀害，活动受挫。

1900年9月至1938年为建立组织修建教堂，扩大发展教徒，每星期日教徒举行礼拜，宣传福音，进行各项活动的兴旺时期。

1939年至1945年，日本侵略天津，驻地日军，禁止了基督教活动。

1946年至1949年，日本侵略军投降后，宗教活动又得以恢复。

1950年至1958年解放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导下，又逐渐兴旺起来。

1959年至1978年，宗教场所被占用，尤其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在极左路线干扰下，宗教基本上停止了活动。

1979年至1992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，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，宗教活动重新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时期。

●艰难岁月

日军侵华时期杨柳青见闻录

张荣山

今年已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一周年，二十年来经过两国人民共同努力，中日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两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在《中日联合声明》和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地基础上，着眼未来，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，使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。不再重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覆辙。为此，仅就我个人在日寇侵华时期在杨柳青的所见所闻概述如下，做为对历史的回顾。

一、肆意屠杀无辜百姓

在日军占领杨柳青的当年秋季，杨柳青的农民每到铁路两侧收庄稼，武装日军乘坐“汽驴子”（机动铁路巡逻车）沿铁路横冲直撞，见到铁路附近有三、五成群的中国人干活，举枪瞄准人群就射击，拿中国人当活靶子，时常有人被击中身亡。

一位家住西街姓李的农民曾对我讲过：1937年秋收时节，有三位西街的农民，一位姓张，另两位姓王。一天他们在地里收庄稼，傍晚回家时路过杨柳青火车站西面的搬道房，守卫车站附近的日军看见这三位农民赤着上身，一个人在腰间系着皮带，一个人系着“腰里硬”，另一人上身露着兜肚。日军见了顿起疑心，当即用刺刀把这三个人活活刺死。将尸体扔在铁路旁的小河沟里，直到转年春天才由三人的家属把死者的尸骨掩埋了。

一次，我在万字会胡同行走，看到几名日本兵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，拥着一被绑的中国人（这人穿黑色衣服、约有四十多岁）从日军驻地（今第一小学）出来向南运河方向走去。后来据我的邻居说，这几个日本兵把这位中国人押到运河南面空地上，几人一齐上前用刺刀将这人杀死。

一天，一位姓赵的妇女回水高庄娘家，不料路遇几个拿枪的日本兵，他们将这妇女轮奸后，又用刺刀剖开她的腹部，其惨状令人发指。

当时，我曾在“福音堂”美国传教士的住室中见到一本由传教士代别人保存的杂志，上面刊登了三幅日军在沦陷区屠杀中国人的照片。其中一幅是摆成一行被杀的中国人的头颅；一幅是日军活埋中国人的场景，他们把被捆绑的中国人放在土坑里，把土埋没了全身只留头部在外；一幅是日本军官正用军刀向中国人头部砍去，我看了之后心如刀绞。

除此之外，日军还在无形地杀害中国人。当时杨柳青镇上有人公开设立鸦片烟馆（在乔家疙瘩北头），贩卖鸦片烟和提供吸食场所。还在猪市大街（今25号院）开设妓女检治所，实际是给妓院的妓女提供卖淫的方便，引诱不走正路的人去嫖娼，传染性病。

二、随处侮辱毒打群众

我听居住十四保（保甲情况后面详谈）的农民李德年说，在1937年秋收季节，他和同保的共八位农民一起到子牙河南岸田地摘棉花，看到日军乘坐（把杆木船）在河上航行，船的前方有两名日本兵持枪在沿河南堤上步行做先导。这两名日军看见这些农民，就示意农民到他们面前来，当时八位农民各个拿着棉花举到日军面前，一面说话一面打手势，以表示自己是农民，正在摘棉花。其中一名日军大声呵斥，让农民排成一行，立刻举起步枪把